臺大歷史學報第34期
2004年12月，頁87~147

BIBLID1012-8514(2004)34p.87-147
2004.11.1收稿，2004.12.3通過刊登

寫實與規範之間
——公學校國語讀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

周　婉　窈*

提　要

本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國語讀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及其涵義。從一八九八年公學校設立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總督府總共發行五期國語讀本，每期都有豐富的插圖。本文比對各期臺灣人形象的特色及其間的差異，以及插畫所呈現者和社會實況之間的關係，進而探討其背後的時代推移與政策變化等因素。

透過研究，本文發現國語讀本中的插畫，具有兩個面向：一則反映歷史現場的臺灣，再則顯示殖民統治者的規範意圖。而且，兩者之間的比重消長因時代而有所不同。第一期讀本的臺灣人形象相當程度反映當時的臺灣社會景況（如纏足、梳辮、穿著傳統服飾等），但也看得出規範的意圖（如女孩不纏足、無吸鴉片景象）。在第二期插畫中，臺灣人以「男斷髮女不纏足」的新形象出現，雖然不全然寫實，卻也預示著時代的走向。第三期出現的重大變革是「改裝」——臺灣人不再穿著傳統服飾，且加強「內地風」（日本風）。插畫中的「民族界線」逐漸模糊。第四與第五期讀本使用於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1945），插畫的中的臺灣人，從起居到穿著完全日本化了。

五期插畫中，臺灣人形象愈是前期愈寫實，愈到後期則規範意味愈濃厚，愈遠離社會實況。五期插畫也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殖民政策從早期的舊慣溫存到最後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巨大變化。

關鍵詞：日本在臺殖民地教育　國語讀本　教科書插畫　臺灣人的形象　皇民化運動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言
一、五期國語讀本的插畫概述
二、與舊慣溫存的早期插畫
三、男斷髮女不纏足的新形象
四、改裝與內地風的加強
五、規範意味濃厚的後二期插畫
六、小結：從寫實到規範

前言

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締結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遂成為日本模仿西方列強取得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即積極著手殖民地教育工作，不數年建立近代學校教育制度，致力於普及初等教育。關於殖民地初等教育的內容與影響，近年來頗受研究者注目。筆者過去以公學校「國語」（亦即日語；由於是歷史用語，以下行文恕不另加引號）讀本、修身書、歷史用書為分析對象，撰寫數篇論文。在研讀這些為數不寡的教科書時，常常被書中的插畫所吸引，有時盯著插畫，失神良久。我忍不住暗思，當初使用這些教科書的孩童，也應該深深被吸引吧？對學童來說，說不定插畫所傳達的訊息比文字更深入他們的內心。

由於對插畫產生興趣，過去數年來，我曾將手邊擁有的五期國語讀本的插畫一一整理出來，略作排比，我發現其中蘊含豐富有趣的訊息，值得深入探討。二〇〇三年春節左右，我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歷史研習營」發表過一點心得，可惜當時收集的教科書不全，未窺全貌，無法寫定。今年初夏，經過筆者和臺灣教育史研究會三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仁前後五年的努力，全五期的國語讀本終於由南天書局重刊問世。[1]有了完整的讀本，我於是以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為主題，重新整理這些圖片。我發現國語讀本中的插畫，整體來說具有兩個面向，一則反映歷史現場的臺灣，再則往往顯示統治者明顯的規範意圖；兩者之間的比重消長因時代而有所不同。私意以為透過教科書插畫可以探討的問題很多，本文僅從插畫中所呈現的臺灣人形象來加以探討，並未涉及插畫的製作、畫風等美術史的議題。但願這篇文章能引發更多人從不同的角度來抉發殖民地教科書插畫的多重意涵。

附帶一提，使用於臺灣公學校的國語讀本和使用於日本本土的國語讀本，在內容方面頗有重疊之處，重疊的情況依發行之版本而有所不同，插畫最初各自繪製，即使課文內容相同，亦分別製作；到了太平洋戰爭後，發行最後一期時，方出現同一課文的插畫採用同一圖版的情況。[2]然而，這些有類似或相同插畫的課文大抵和日本的神話、歷史與文化有關。至於本文所擬討論的臺灣人形象的插畫，則是配合以臺灣學童為對象的課文而繪製的，與日本本土讀本的插畫不相干涉。

一、五期國語讀本的插畫概述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五十年內，臺灣總督府總共發行過五個版本的國語讀本，茲沿用戰前日本本土國定國語教科書的分法，分為五期。臺灣

1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策畫，《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臺北：南天書局，2003／實際發行 2004），全五期 60 冊。

2 一九四五年之前日本文部省總共發行過五期國定國語教科書（1903~1945），收於海後宗臣編纂，《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東京：講談社，1964），卷 6~8。臺灣公學校讀本共發行過五次（分期見正文第一節），從第二期開始，在編排上大抵以同期的日本國定國語讀本為範本，課文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根據筆者初步的比對，臺灣公學校第二、第三期讀本，和同期日本讀本的課文，題材近似或內容相同時，插畫則略有不同，顯然是在臺灣繪製的。第四期（1937~1942）開始，如果內容相同，臺灣讀本的插畫明顯可以看出以日本本土的插畫為範本，幾乎等同摹寫，然非套用；到了第五期（1942~1944），課文相同時，臺灣讀本的插畫則直接採用日本讀本的圖版。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學校五期讀本出版年份、書名、卷數如下：

第一期（1901~1903）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 卷一至十二

第二期（1913~1914）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卷一至十二

第三期（1923~1926）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一至十二

第四期（1937~1942）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一至十二

第五期（1942~1944）コクゴ 一二、こくご 三四、初等科國語 一至八

第一期採用竹子紙（以桂竹為材料的手工紙）對摺，四孔穿單線裝訂，是所謂的「和本」四目裝幀，採活版印刷，由於紙質優良，百年後狀況仍相當良好。第二期開始改採工業造量產印書紙印製，打釘裝訂，鉛字印刷。第一至第三期插圖全部為黑白印刷。第四期卷一至卷五的插畫是彩色印刷，餘為黑白；黑白插圖中首次使用照相製版。第五期卷一至卷四的插圖是彩色的，餘為黑白。附帶一提，第四期讀本是五期中印得最好的一期，紙張非常結實，彩圖精美。[3]

從第一期和裝本《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開始，每期讀本都有為數甚夥的插圖。第一期國語讀本十二卷各卷之插畫與頁數之比例依序為：20/28、24/36、32/42、28/50、22/56、23/64、18/68、17/76、17/82、17/90、20/90、18/96。[4]據此，低年級圖文的比例頗接近，幾乎每頁都有插畫。卷四以後比例降低，不過，即使到了高年級讀本，每卷仍維持十七至二十組的插畫。

隨著殖民地教育的進展，第一期以後的讀本文字分量越來越重。一般而言，低年級讀本的插圖數量頗多，高年級讀本則插圖的比例減低。限於篇幅，在此僅以最後一期卷一、卷五，以及卷十二提出抽樣統計，

3 關於五期國語讀本的裝幀與印刷，詳見魏德文，〈從重刊《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看教材印製史與景印始末記〉，《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0 期（2003.10，臺北），31~33。

4 讀本中的插畫時常出現一個畫面有一幅以上的圖，如卷十二第一課〈景色〉一文，嚴島、天橋立，以及松島三景畫在同一畫面，很難分開計算，姑且算作一組。類似的情況頗多，基本上緊鄰而在同一畫面者視為一組。若以單幅計算，超過上列的數目。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供讀者參考。第五期《コクゴ》一，課文共八十二頁，除了最後三頁的片假名表和漢字表之外，每頁皆有彩色插圖，兩面皆圖無文字者佔十八頁，跨頁圖七幅，不能不說相當豪華。剛入學的兒童一拿到新書，翻開一看，想必印象深刻——前十頁全部是彩色圖繪，其中一張學校的跨頁圖，兩張村莊鳥瞰的跨頁圖，若說圖勝於文，實不為過；有文字的地方，圖約佔一半的空間，和文字平分秋色。以戰爭結束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來說，整本充滿圖繪的課本，應可令孩童，尤其是鄉間的孩童，愛不釋手。《初等科國語》一（也就是第三學年用，等同於其他期讀本的卷五）共一四二頁，有四十六組黑白插畫，幾乎等於每三頁就有一組插畫，和第一期卷五圖文的比例差不多。《初等科國語》八（等同卷十二，最後一冊）共一五五頁，有黑白插繪十七幅，大多以最新的照相製版技術印製。

綜而言之，插畫是國語讀本非常重要的構成要素，尤其是低年級用讀本。那麼，五期讀本的插畫有何特色呢？五期讀本的使用時間橫跨日本殖民統治的四十五年（1901~1945），每期讀本的修訂各有其獨特的因素，課文內容包羅萬象，配合課文的插畫也因此林林總總，要從中整理出一個脈絡，誠屬不易。雖然如此，由於國語讀本橫跨的時間頗長，以時間為縱軸，或可看出一些有意義的現象。

使用於臺灣的國語讀本，在低年級用書中，往往從兒童日常生活教起，插畫配合課文內容，大抵以兒童為主角。以兒童作為課文的主人翁，乃是希望兒童對書中人物（虛擬人物）產生認同，因認同而效法，以達到教育的目標。以此，教科書如何呈現兒童形象，相當程度型塑了兒童的「自我認知」。此外，兒童所隸屬的社群在教科書中如何被呈現，也是近代教育興起之後，社群「自我形象」的一個重要來源。在殖民地，這樣的形象，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實則牽涉到統治者如何呈現被統治者，以及如何規範被統治者的問題。

二、與舊慣溫存的早期插畫

如所周知，日本統治臺灣，從領臺之初的兵馬倥傯到最後發動太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洋戰爭而失敗投降為止，臺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生活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時代的變化反映於教科書中嗎？讓我們逐期分析比對國語讀本中有關臺灣人的插畫。

第一期《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全十二卷發行於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之間，距日本領有臺灣才七至九年，此時絕大多數的臺灣人還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臺灣公學校制度實施（1898）之後，第一套國語讀本如何處理臺灣人的形象呢？想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探究第一期國語讀本插畫是否有既定的繪製原則。一八九八（明治31）年九月十八日，以小川尚義為首，十餘位學者和教育者在艋舺祖師廟召開「國語教授研究會」第一回會議，至一八九九（明治32）年五月二十七日，共召開十二回「國語教授研究會」。會議的決議就是日後《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的編纂綱領。[5]根據第十二回「國語教授研究會」的記錄，其中一項是關於插畫的備忘，云：「插畫以容易引發學生之同情的本島事物為始。」[6]在此，「同情」的意思，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就是「親切的認同」。

首先簡單介紹此期國語讀本的內容編排。這一期從卷一到卷四，也就是低年級用書，每課的組成是：課文、應用、土語讀方。應用是課文內容的應用之意，土語讀方意為方言的讀法，以片假名標注臺灣話（閩南語）的方式，教授臺語。卷一課文除了「五十音字」等表外，附有標注閩南語音的「符號字」與「八聲符號」表。卷五卷六，應用和土語讀方交叉出現，卷七以後則以「新用語」取代應用，土語讀方出現的頻率逐漸減低。《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一第一課，課文曰：「男孩子起床了。」插畫畫著一位穿肚兜的臺灣孩童正在起床。應用曰：「女孩子寫了字。」其下畫著一位梳髻纏足的小姐，手上拿著一張毛筆字練習紙。土語讀方作：「囝仔起來了。」[7]（書影見圖1）觀此插畫，不能不

5 《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的編纂原則，除了「國語教授研究會」的決議外，還參考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實驗結果，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39 冊，7 號，〈公學校讀本卷二審查委員會ニ付託及同會報告〉。

6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吉野秀公發行，1927；臺北：南天書局，1997），177。

7 I-1-1，4b-5a（I 表第一期國語讀本，其次之 1 表卷一，再其次之 1 表第一課，後為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確實體現了「以容易引發學生之同情的本島事物為始」的原則。[8]

此期國語讀本中的臺灣人幾乎清一色以傳統服飾出現。為了比較有系統呈現這些插畫的臺灣人形象，讓我們由幼及老，先男後女，予以說明，並取樣置於附圖中。此時臺灣人穿著清朝服裝，日後相對於西服與和服，有稱之為臺灣衫褲的；以下行文有時也用臺灣衫褲來指稱臺灣人所穿著的清朝服裝。圖2-1的幼童，坐在翻倒過來橫擺的竹凳中，作勢抓蝴蝶。身上穿著簡單的汗衫汗褲，頭上剃光，只留下頭頂一小撮頭髮，紮個小髮辮；插畫中也有髮上紮三個小辮子的幼童（圖2-2右下）。[9]年齡稍大一點的男童的典型裝扮是，穿傳統衫褲、剃髮紮小辮子；他們工作或玩耍時，往往把髮辮盤繞在額頭上（圖3-1、3-2）。[10]他們所穿的上衫，最多見的是大襟衫（第一鈕扣在喉際，二三鈕扣在右肩窩，第四鈕扣在腋下），但也有對襟衫（領口直下扣一排鈕），俗稱「對襟仔」。大多數兒童穿著簡單的臺灣衫褲，赤腳的居多，但也有穿對襟背心、戴小帽（瓜皮帽）、穿布鞋的正式打扮（圖4）。[11]成人男性一般穿著簡單的臺灣衫褲，但也見得到相當正式的穿著，如圖5所示，一戴紅緯帽（官帽），著長袍，一戴小帽，長袍外罩對襟馬褂，兩人皆穿黑包鞋。[12]值得注意的是，插畫中也有打光脖的男佣人造型（男佣人日文稱為「下男」）。[13]

年紀尚小的女孩留「鶏角」（圖6-1）；稍大一點的女孩，有前額留劉海、紮髮辮的（圖6-2），但更多時候梳髮髻、戴眉勒簪花，她們

碼；以下注記依此類推。）。

8 此期讀本在內容上注重「與學生之日常思想一致」、「本島風俗的採用」等，見《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 539，7 號，〈公學校讀本卷二審查委員會ニ付託及同會報告〉。

9 圖 2-1，《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 3 第 12 課。圖 2-2，I-1-7[2]（[2]表同一課插圖中的第二幅，以下注記依此類推）。另一年紀稍大仍紮一撮小髮辮的小孩，見 I-4-4[2]。

10 圖3-1，I-2-2；圖3-2，I-2-12[1]；I-4-2。

11 I-4-2。

12 I-6-8。

13 I-4-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穿大襟衫褲（圖6-3、6-4）；[14]小姐則大抵梳髻，且顯然看得出纏足（圖7）。[15]婦人纏足，梳髻簪花，著寬袖大襟衫褲，外出的打扮給人華麗的感覺（圖8-1、8-2）；[16]打光腳、沒纏足的是女傭人（下女），穿著寒素（圖9-1、9-2）。[17]

此期讀本插畫中的主人翁以男童為數最多，女子不論是幼童、少女或小姐相對地少。這或許和當時殖民統治者預期女性學童就學率低有關，教科書的編寫因此以男童為主要對象。插畫中的男童人人辮髮，可說相當寫實。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1893~1986）屬於最早就讀公學校的第一批臺灣人，他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初至一九〇九年三月底之間就讀滬尾公學校，也就是這套教科書使用期間。杜聰明晚年參加公學校同年級晚餐會時，曾賦一首七言絕句，詩云：「竹馬相交六十年，各垂辮子共窗前。」[18]生動地寫出公學校男學童腦杓上人各一辮的光景。

此套讀本編纂時，臺灣漢人（尤其是閩人）纏足風氣很盛，就是在讀本使用時期（1901~1912），纏足風氣尚未消退。根據統計，一九〇五年纏足的臺灣婦女佔女性人口的56.93%，降至一九一〇年代，公學校纏足的女學生仍為數不少，有舊照片可為明證，如一張題為「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午前八時過後於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生徒寄宿社攝影」的照片所示，前排十位女學生中有六位明顯看得出纏足。[19]明治四十三年是西元一九一〇年，因此，此期插畫中的婦女大抵作纏足模樣，可說頗為寫實。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比對，將會發現插畫中年紀小的女孩並未纏足。[20]這可就不怎麼寫實了，教育和規範的用心昭然若揭

14 圖6-1，I-2-8；圖6-2，I-2-4；圖6-3，I-3-11[2]。

15 I-1-2[1]。

16 圖8-1，I-2-9；圖8-2，I-2-5[1]。

17 圖9-1，I-4-6[1]；圖9-2，I-4-9。

18 杜聰明〈出席滬尾公學校同級晚餐會〉詩，見杜聰明，《回憶錄——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34。杜聰明於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本科第二學年時斷髮，也就是一九一一年。

19 照片刊載於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錄》（臺北：南天書局，1995），42。

20 如I-2-4、I-2-8、I-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就是希望女學童以不纏足為自我形象。事實上，這一期卷九有以「纏足」為題目的課文，教導兒童纏足的壞處，並指出「近頃的兒童漸漸不纏足了，這誠然是好的事情。」[21]明白顯示以教育移風易俗的用心。

就女性服飾而言，此期插畫所呈現的頗具現實的根據。一般而言，有清一朝滿人的婦女服飾，早期偏於瘦長，袖口亦小，晚期變化極大，變寬變大，重層累綴。[22]降至同治光緒年間，流行上著寬袖衫、下束裙，光緒中葉流行穿寬袖杉、下著寬筒褲，光緒末年以上著窄袖加套袖衫、下束裙為時尚。[23]臺灣婦女的流行服飾也是此一潮流的支脈。根據服飾方面的研究，臺灣婦女於一八七〇至一八九〇年之間流行寬袖大襟衫束裙，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之間流行寬袖大襟衫著褲，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流行窄袖大襟衫束裙。[24]第一期國語讀本編纂時（1899~1901之間），[25]也就是臺灣婦女流行寬袖大襟衫著褲之時，而且此時的寬筒褲以呼應對襟的多層鑲滾為尚。以此，第一期讀本中的婦女可說穿著當時最時新的服裝。此外，光緒年間婦女十分流行戴眉勒，以後大抵只有年老的婦女才戴（老人常用青黑色，俗稱烏巾箍）。[26]插畫中的女孩和小姐大都戴眉勒簪花，因此也是當時流行的裝扮。同一時期婦女的時新打扮在霧峰林家以及不少舊照片中可窺其一斑。[27]

---

21 I-9-13，32。

22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88，臺灣版），465~466。沈從文認為清初滿人婦女服飾受到明代南方地主文化的影響，偏於瘦長，袖口亦小，衣著配色極調和典雅；晚期變化極大，「由頭到腳，和個暴發戶差不多」。

23 袁杰英編著，《中國歷代服飾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02；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臺北：南天書局，1989/1992），496。

24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錄》，66。此一流行服飾的分期或有待進一步修正。如果以女學生的裝扮來說，一九一〇年仍流行窄袖過膝大襟衫，下著窄筒褲，而非束裙。

25 根據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1，此期編纂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至三十四年（1901）之間。

26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錄》，170。婦女戴眉勒（遮眉勒）普見於明代，清初似乎仍頗流行，如《雍正十二妃子圖》即有此裝扮，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416、465~466。

27 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錄》所收照片大抵注明年代，可以用來比照。霧峰林家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傳統服飾之外，插圖描繪臺灣孩童生活的各個面相，可說鉅細靡遺，從早晨穿著肚兜起床、穿衣、洗臉、吃飯、掃地、上課、玩耍、放學、幫忙家務、餵雞、睡前點燈點蚊香，到脫鞋上床睡覺，都一一入畫。[28]使用這套讀本的臺灣學童應能從這些圖繪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臺灣人日常生活的器物，也到處可見，如四方有帷幕的「眠床」、長方形有夾層的木板飯桌和條凳、高腳洗臉架（圖10-1、10-2、10-3）等。[29]臺灣農村發展迅速，這些家俱大多已消失殆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算是骨董了。此外，描繪鄉村景觀和生活的插畫，數量極多，頗有民俗畫的味道，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這些插畫顯示插畫作者對臺灣傳統生活細節的熟悉和關心，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作者對他所描繪的對象有某種程度的感情投入。例如圖7裹小腳的小姐，對鏡理裝，體態婀娜，與其說顯示對舊慣的批評，毋寧說流露出一種賞悅的心情。

一九三七年，臺灣總督府編修課長加藤春城曾說這一期讀本是「立足於本島之事情的特異之物。」[30]從事後（三十年後）的眼光來看，這套讀本本土色彩過於濃厚，是個奇怪的存在——但當時人並不覺得奇怪。就此期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來說，雖然傳統，卻不會引起不好的觀感；孩童的意象也稱得上可愛。此期讀本編纂時正是後藤新平（1857~1929）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1898~1906）的時候，後藤新平在文教方面採取「舊慣溫存」政策，所謂舊慣溫存就是對臺灣人原有的風俗習慣予以適度的尊重。然而，官方予以適度尊重的舊慣是選擇性的，「吸食鴉片」不在此內，因此，我們在插畫中看不到當時很普遍的吸食鴉片的情景。實則，如同纏足，此期有一篇課文題為〈阿片〉，教授吸食鴉

片，可參考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28 早晨穿著肚兜起床（I-1-1[1]）、起床穿衣（I-2-1[1]）、洗臉（I-1-3[1]；I-2-2）、吃飯（I-1-5[1]）、掃地（I-1-4[1]；I-3-3）、上課（I-3-8）、玩耍（I-2-13）、放學（I-4-17[2]）、幫忙家務（I-2-8）、餵雞（I-3-4）、睡前點燈點蚊香（I-3-17[1]）、脫鞋上床睡覺（I-3-17[2]）。

29 圖10-1，I-3-17[2]；圖10-2，I-3-6；圖10-3，I-1-3[1]。

30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上）〉，《臺灣教育》419（1937.6，臺北），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對人體的毒害。[31]綜而言之，如果說此期的插畫富有「舊慣溫存」的精神，應不為過。

本土色彩之外，在此必須附帶討論讀本中的「日本色彩」插畫。所謂日本色彩，指事物的特徵具有容易辨識為屬於日本者，如和服、木屐、榻榻米等。如所周知，臺灣殖民地教育的開創者是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1851~1917），伊澤在領臺之初即主張殖民地教育之長期目標在於把臺灣日本化（臺灣を日本化する）。[32]臺灣的殖民地教育基本上遵循此一大原則，惟五十一年間不同時段內各有其特色和具體方針。以此，透過教育教導臺灣人認識日本、學習日本的歷史文化，是極為重要的。國語讀本中和日本有關的課文隨著年級上升，分量愈來愈重。第一期國語讀本中有〈桃太郎〉（日本童話）、〈我國的歷史一〉（日本神話）、〈井上傳〉（日本人物）、〈仁德天皇〉（日本歷史）、〈織花藺草蓆子〉（日本文物）等課文，配合課文的插畫自然是日本色彩的。這類插畫基本上沿襲日本尋常小學校讀本的插畫，有一定的畫法，如「神代」（神武天皇即位前神所統治的時代）人物的衣著髮飾等，非能任意為之。由於探究其沿革實屬另一範疇的研究，[33]如果雜入本文來討論，勢必過於龐雜，因此，在此擬分析的，不是這些在定義上就必然是日本色彩的插畫，而是那些低年級課文中常見的虛擬人物及關聯情境的插畫。所謂虛擬人物，是指課文擬想的非真實存在的主人翁，有時有名字，有時沒有。低年級讀本往往稱他為「孩童」（コトモ）、「這個小孩」（コノコ）；有時直接說「兄」、「弟」、「姊」、「妹」如何如何，這裡隱而不見的「我」就是使用此一讀本的孩童自身。

此期卷一即有日本人的插畫，共四幅，佔插畫的五分之一。前三幅分別是穿和服的男童讀書、洗手、寫字的模樣，最後一幅是男孩出門上

31 I-8-16。

32 伊澤修二，〈國家教育社第六回定會演說〉，收於伊澤修二，《伊澤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593。

33 關於日本尋常小學校國語讀本插畫研究，可參考芳野作市，《國語讀本插畫の精神及其解說》（東京：明治圖書㈱式會社，19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前向父母跪地行禮的模樣（圖11）。[34]它們是「應用」的插畫，不是正文的插畫；正文的主人翁一概是臺灣孩童。卷二中穿和服的日本人也都出現在「應用」，其中雜有穿西服者，理論上也是日本人（圖12），[35]它們獨立成圖，和以臺灣孩童為主的插畫明顯區隔開來。卷三開始在課文中出現一位穿西服的學童，由於課文只稱主人翁為「這個學生」（コノセイト），無法從文字判斷他是日本人還是臺灣人。這位學生穿著深色高領學生服，戴學生帽，著及膝短褲，穿長襪、短靴（圖13），[36]對當時普遍穿臺灣衫褲的臺灣學童而言，這副嶄新的打扮大概只能想成日本人。其他如哥哥穿西服，妹妹穿和服，自然非日本人莫屬。[37]當課文的主人翁開始有名字時，我們發現這位令人眼熟的學生叫做「太郎」，他的弟弟叫做「次郎」；太郎有時穿西服，有時穿和服。[38]總之，我們從插畫中歸納出：插畫中穿和服和西服的是日本人。相對於臺灣衫褲，和服是日本人的表徵，而西服是進步的象徵；插畫中可以交互穿和服與西服的日本人，代表著進步。

通觀第一期讀本，日本人和臺灣人出現在同一場域的插畫很少，除了來家裡訪問、上下學途中外，[39]只限於市場、銀行和節日慶典等場所。[40]因此，我們可以說，此期插畫所呈現的臺灣人和日本人形象截然不同，服飾標誌著民族的不同；而臺灣人社群和日本人社群，基本上是隔離的，不相干涉的。

34 I-1-2[2]、I-1-3[2]、I-1-4[2]、圖11，I-1-10[2]。

35 I-2-5[2]、I-2-10[2]、I-2-11[2]、I-2-12[2] 、I-2-14[2]。圖12，I-2-5[2]。

36 I-3-7。

37 I-3-12。

38 I-3-8、I-3-10、I-5-16。

39 I-2-9、I-3-5、I-3-10。

40 I-10-7〈商業〉、I-10-6〈貯金〉、I-6-8〈天長節〉、I-6-15〈一月一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男斷髮女不纏足的新形象

第二期《公學校用國民讀本》於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發行，距第一期讀本之發行恰有一紀之隔。兩期讀本從裝幀到內容編排都有顯著的不同，插畫在題材和繪畫風格上，也有很大的差別。就題材而言，第一期讀本有大量描繪臺灣人傳統生活的插畫，是以人為中心的；第二期讀本則以知識性插畫為大宗，包括動植物、器物、地圖、景觀等，以人為主角的插畫相對減少。雖然如此，透過人物圖繪，我們還是能明確地看出殖民統治者選擇呈現的臺灣人形象。

剪掉辮子，蓄短髮，在當時稱為「斷髮」。首先，這一期插畫中的男學童一概斷髮，剪極短的頭髮，類似今天的三分頭，他們穿臺灣衫褲，或戴帽（學生帽）或不戴帽（圖14）。[41]青年和成人男子也都穿臺灣衫褲，青年戴西式草帽，成人外出戴西洋禮帽（圖15-1、15-2）。[42]女童的典型打扮是留劉海，腦後梳辮，著臺灣衫褲（圖16-1、16-2）。[43]根據一九一〇年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師生合影照片，這是當時女學生的標準打扮。[44]稍大的女孩留劉海，梳髻；婦人服飾趨於簡樸（圖17）。[45]值得注意的是，婦女不分老少，一概不纏足。她們的服裝較前修長，上衫過膝，袖口和褲管趨於窄小。此期不再看到梳髻、戴眉勒簪花的女孩，也沒有穿寬袖大襟衫的盛裝婦女。[46]

由於第二期插畫中的男女都還穿著傳統的臺灣衫褲，因此，和第一期相比，此期臺灣人形象的最大「變革」是：男斷髮，女不纏足。這個「變革」反映當時的臺灣社會景況嗎？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了解第二期國語讀本插畫是否有提綱挈領的原則可循。臺灣總督

41 II-2-6。

42 圖15-1，II-3-4；圖15-2，II-1-p18（由於低年級讀本一開始往往不分課，因此在課次的地方代以頁碼，以18表第18頁，以下依此類推）。另外戴草帽的青年見II-1-p28、I-1-p31。

43 如II-1-p27、II-2-10。

44 照片可參考高本莉，《臺灣早期服飾圖錄》，42兩張圖版。

45 II-2-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發行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編纂趣意書》，關於此期插畫，有如下的說明：

> 插畫以給予兒童適確印象為主要著眼點，隨著進階到上級，漸次減少其數量。又當描繪人物、衣服、家屋等之時，盡可能注意適合佔人民之多數之中流以下之社會實況，另一方面則期推察時勢世運之趨向，並接近帝國之風尚，不採辮髮纏足等。且就插入文中之位置而言，力求有上下左右之變化。[47]

據此，除了技術性問題（圖文比例和配圖位置）之外，插畫的繪製以寫實為原則——描繪（臺灣）人物、衣服和家屋等，須盡量適合中下流社會的實況，但在另一方面，為了適應時代和世界潮流，並且接近日本的風尚，不畫辮髮和纏足。用概念性的語言來說，「不採辮髮纏足」的理由在於追求「近代化」和「日本化」。換句話說，插畫的寫實風格在臺灣人辮髮纏足這一點上，出於特別的考量，是打折扣的。

日本領臺之初，殖民當局將吸食鴉片、辮髮、纏足視為臺灣「三大陋習」，亟思革除。然而，鑑於風俗改變不易，臺灣人武裝抵抗正風起雲湧，因此對禁格這些習俗抱持審慎態度，不希望因遽行禁格而刺激臺灣人。就辮髮和纏足而言，殖民當局採取漸禁政策，不明令禁纏斷髮。雖然如此，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種管道（如學校教育和新聞媒體），積極鼓勵誘導臺灣人斷髮放足。一九〇〇年，以黃玉階為首的臺灣紳商於臺北大稻埕成立「天然足會」，開始推動「解纏足運動」（「解纏足」即放足、小腳放大之意）。然而「天然足會」成立後的前幾年，放足運動成效不大。如前所述，一九〇五年臺灣纏足婦女的比例高達56.93%，不過，其中十六歲以下的女子纏足比例顯著減少，放足者也增加。放足運動要到一九一一年以後方才蓬勃發展。一九一五年四月，在臺灣士紳的籲求下，臺灣總督府終於在「保甲規約」中加入禁止纏足的條例，正式透過公權力以求達成革除纏足習俗的目標。根據統計，一九一五年纏足

46 II-2-3、II-2-14。

47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2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婦女降為17.36%。[48]

第二期國語讀本於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之間發行，也就是在放足運動蓬勃發展之後，此時臺灣婦女纏足人口正大幅度降低。就年齡層而言，一九一五年，十歲以下纏足百分比是0.30%，十一至十五歲是3.48%。[49]女學童不纏足的情況愈趨普遍，一九一四年之際，臺北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一百十餘名學生中已無人纏足，[50]因此，使用這套讀本的女學童和插畫中的女學童形象大致符合，然而，此期讀本於一九一二（明治45）年四月以後開始進入編纂階段，[51]在這個時點，纏足的女性成人仍多，插畫一概作不纏足，是不寫實的。

臺灣男子斷髮的普及，比起女子放足，可說後發先至。日本統治之初，斷髮人數極少，殖民政府只能從官僚和教育機構入手，大力宣傳並鼓勵斷髮。臺灣斷髮風氣的興起以學校為中心。一九一〇年年底，臺灣兩大最高學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的學生爭相剪髮，前者斷髮者約四分之一，後者則有半數斷髮；影響所及，公學校學生斷髮者亦日增。在這同時，一九一〇年以後，中國大陸因受革命影響而興起剪辮之風；韓國併入日本（1910）之後，韓人亦爭斷結髮，以此為背景，臺灣遂有組織性的斷髮運動。從舊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九一〇年霧峰林家子弟（包括林獻堂）都還留辮子。[52]一九一一年初，謝汝銓與黃玉階共同發起「斷髮不改裝會」，積極推動斷髮運動。組織性斷髮運動展開之後，不久即在全島各地獲得熱烈的響應，一年之間臺灣社會中、上流階層及學生大

48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248~252、256~264、269~272、294~296；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28~30、71。

49 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五年年齡別纏足統計表，見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71。

50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266。

51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1914），1。

52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74~75圖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已斷髮。[53]換句話說，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間，臺灣男子斷髮蔚為風潮。以此，編纂於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三年之間的第二期國語讀本，插畫中的男性一概剪短髮，不能不說既走在時代之前，又符合時代的脈動。

除了斷髮與不纏足之外，第二期插畫中的臺灣人服飾，比起第一期簡樸多了，不再有盛裝的婦女和穿長袍馬掛的男性，也看不到女僕人和男僕人，可以說踐行了插畫的原則：「當描繪人物、衣服、家屋等之時，盡可能注意適合佔人民多數之中流以下之社會實況。」畢竟只有上流家族的婦女（如霧峰林家）才穿得起多道鑲滾的華麗衫褲，也只有上流家族才雇得起女傭男僕，遠非中流以下之社會的實況。

此期雖然不若第一期有大量的傳統臺灣式生活插畫，但課文的呈現方式仍頗具本土色彩。如前所述，第一期課文中的主人翁大抵是「孩童」、「這個小孩」，或隱而不見的「我」及其兄弟姊妹等。到了第二期，主人翁堂堂以臺灣人習見的小名出現，他們是阿仁、阿福、阿信、阿秀、阿玉等。因此，雖然插畫的臺灣孩童數量較第一期少，課文可是充滿臺灣色彩。

在日本色彩方面，這一期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此期讀本從單字教起，中性的單字也有配以日本色彩的插畫的。其一為單字「旗」，插畫是日本國旗和軍旗；其二為單字「風箏」，畫著五張風箏，一張以日本軍旗為圖案，其餘大抵為日本風格。[54]雖然如此，低年級用讀本插畫中的主人翁，幾乎清一色是臺灣學童，唯一例外是卷一第二十八頁的插畫，畫有觀看烏龜的兩位男孩，一位著臺灣衫褲，一位穿和服，兩人皆戴西式草帽。卷三第一課畫著兩位男孩一起看日出，一位著臺灣衫，一位著水手領的西服，戴學生帽。從課文看不出民族別，用意或在於顯示（或期望）臺灣人和日本人可以無所隔閡地生活在一起。另外，卷五兩幅插畫中的兒童穿和服，根據課文，我們知道主人翁是「次郎」，是日本人。[55]雖然有少數的日本人，此期課文的主人翁（或虛擬人物）

53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265~269。

54 II-1-p2~3。

55 II-5-10、II-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是以臺灣兒童為主體。值得注意的是卷二第四課的插畫。該課課文如下：

> 「你的名字叫做甚麼？」「我的名字叫做林阿仁。」「幾歲呢？」「八歲。」「幾年級？」「一年級。」

插畫中和林阿仁走在一起的成人男性，穿和服、戴西洋禮帽。也就是說，林阿仁在上學途中遇到一位日本人，開始以上的對談。這是此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現臺灣孩童和日本成人對談的插畫。除此之外，插畫中臺灣人和日本人一起出現的場域，就只限於市場和車站的公共空間。[56]

綜而言之，第二期插畫中的臺灣人和日本人，基本上是可以用服飾來加以區別的，臺灣人和日本人之間的接觸也相當有限。這個情況和第一期頗為類似。

四、改裝與內地風的加強

第三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於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發行，這是使用期間最久（使用至1936年），且影響最深遠的一套讀本。此期發行時距第二期發行恰滿十年。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此期插畫繪製的準則。臺灣總督府發行的《編纂趣意書》云：

> 修正讀本比舊讀本增加插畫之數量，且盡可能使之具有活力且合乎兒童之性情。而期畫中之人物、服裝、家屋等力求適合社會之實況，又且顯著增加內地風之事物。誠信此係公學校教育進步之自然道程也。[57]

此處所謂修正讀本即第三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舊讀本即第二期《公學校用國民讀本》。首先，此期採取「兒童本位」主義，從兒童的立場

56 II-6-16〈停車場〉、II-8-8〈市場〉。

57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第一種編纂趣意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不詳，可能是1922或192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發，採用和兒童關係深切的教材，[58]插畫也因此力求能引發兒童的興趣，並合乎兒童的性情。其次，強調插畫中的人物、服裝、家屋等實物必須反映臺灣「社會之實況」。最後，也是第三期與前二期最大的不同，是「顯著增加內地風之事物」。何謂「內地風」？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日本本國相對於殖民地自稱「內地」，所謂內地風，就是前面所說的日本色彩。根據趣意書，往內地風邁進被視為是公學校教育進步的必然之路。

那麼，此期臺灣人的形象如何呢？大抵來說和第二期差別不大，惟同中有異。男學童理短髮，雖然仍看得到穿布鈕扣的臺灣衫褲，但標準打扮是著立領前襟五釦（或七釦）上衣、長褲。[59]圖18-1、18-2是第二、三期學生形象對照圖，[60]如用當時的用語來說，第二期是「斷髮不改裝」，第三期則是「斷髮改裝」——放棄傳統布鈕衫褲，改穿扣鈕釦的西服。實際上，在這套教科書使用期間（1923~1936），臺灣男學生的服裝並未如插畫中那麼齊一。一張一九三六年海墘厝公學校（今臺北縣八里國民小學）畢業照顯示，六位男學生皆戴學生帽，其中三位穿著傳統臺灣衫——「斷髮不改裝」，另外三位穿五釦立領或襯衫領上衣，新舊平分秋色。[61]以此，此期讀本的插繪不能不說偏離編纂趣意書所宣稱的：「畫中之人物、服裝、家屋等力求適合社會之實況。」

如果說此期插畫的男子「改裝」了，女子則如同清初「男改女不改」，一概還是穿著臺灣衫褲。插畫中女孩和婦人的服飾和第二期差別不大，惟衫較短，褲管較窄，顯得合身而俐落（圖19）。[62]就流行趨勢而言，此時婦女服裝較前修長合身，插畫可說頗能反映時尚。圖20-1、20-2是

58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上）〉，7。

59 III-2-2、III-2-12。

60 圖18-1，II-1-p6；圖18-2，III-1-p5。

61 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臺灣小學世紀風華——第一本臺灣孩子的百年校園紀事》（臺北：柿子文化，2004），82。

62 III-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二、三期女孩形象的比照圖，[63]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第三期顯得富有「新時代」氣息，圖中年紀小的女孩剪著短髮，有如民國六〇年代的「阿哥哥頭」，清爽而有朝氣。這是插畫中第一次出現剪短髮的女孩形象。[64]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期插畫中祖母級的婦人明白畫出纏足的模樣，[65]比起第二期，這毋寧比較寫實。或許此時纏足習俗已然革除，不再退轉，統治者具有信心，因此纏足形諸插畫亦無大礙。

由於此套讀本使用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1923~1936），到了後期，臺灣婦女服飾起了大變化，而插畫中的女學童一概梳辮子、穿臺灣衫褲，其實已經落伍。容我們再拿前面提及的一九三六年海墘厝公學校畢業照為例，六位女學生中，四位明顯剪短髮，兩位頭髮中分往後梳，看不出是否打辮子，也許只是用髮夾束在頸後。服裝方面，兩位穿白圓領長袖襯衫，外罩背心裙；兩位穿領口打蝴蝶結的長袖上衣，下著褶裙；另兩位上穿大襟衫，下著褶裙。[66]兩兩成雙，正好構成三種不同的服裝樣式。換句話說，插畫中男學生的形象是走在時代前面（實際上還有人穿臺灣衫褲），女學生的形象則落後於時代（實際上開始流行剪短髮、穿洋裝）。

校園外，女性的穿著如何？霧峰林家舊照片中有若干一新會的照片，一新會創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該會自創立以來舉辦各種活動，有專門以婦女和兒童為對象的節目，因此，照片中頗多婦女，老少皆有。這些照片讓我們得以略窺當時婦女流行的正式穿著，其年代正是第三期國語讀本使用的最後幾年。照片中有穿洋服的女孩和年輕婦女，不過穿傳統服飾的仍佔大多數，但所謂傳統服飾已經起大變化——衫裙或衫褲的兩截穿法已被連身袍取代。在照片中，穿下擺長及腳踝的旗袍的女性很多，從小孩到小姐、少婦、老婦都有，可見當時流行的趨勢。雖然仍有一部分女性穿傳統衫，下束及膝裙，但裙子已經是西洋式

63 圖20-1，II-1-p22；圖20-2，III-1-33。

64 同一髮型又出現在III-2-21、III-3-20。

65 III-8-7[3]、[4]。

66 島嶼柿子文化館編著，《臺灣小學世紀風華——第一本臺灣孩子的百年校園紀事》，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至於髮型，花樣頗多，有剪及耳短髮的、有梳垂肩髮型的，有綁辮子的，也有燙頭髮的。[67]一九三〇年代初開始流行的長旗袍自然不可能顯現於編纂於一九二〇年代的讀本中。[68]

如果說第一期插畫充滿「舊慣溫存」的精神，第二期仍富有本土色彩，那麼，第三期則顯示內地風漸次向臺灣社會滲透。此期插畫，如同編纂趣意書所說的，確實「顯著增加內地風之事物」。首先，在單字方面，沿襲第二期，「旗」和「風箏」的插畫頗為雷同，都作內地風。新增單字「屋瓦」和「垣」的插畫是日本傳統建築的屋瓦和竹垣。[69]

單字之外，內地風主要顯示於課文主人翁的呈現方式。如前所述，第一、二期的主人翁絕大多數是臺灣學童，但第三期開始出現把虛擬的主人翁畫成日本生活情境中的兒童，所穿的服裝或是和服，或是洋裝。例如，卷一第三十頁的文句是「請你穿木屐。我穿鞋子。」其下的插畫是兄弟般的兩個男孩站在日本傳統木造屋的緣側[70]上，哥哥穿著水手領洋服、著高統襪，弟弟穿和服，緣側下的墊腳石上擺著一雙皮鞋、一雙木屐（圖21）；[71]同卷第三十九頁的插圖則十足日本風，兄弟兩人都穿和服、木屐，哥哥戴學生帽。[72]此一插圖的課文，卻全然不具「民族別」：「雨停了。太陽出來了。葉子的露珠發著亮光。」在第一、二期，插畫有明顯的「民族隔離」特性，但以上的插畫似乎把這種界線模糊掉了。理論上，「請你穿木屐。我穿鞋子。」中的「我」就是捧讀課文的學童，也就是臺灣學童。這個「我」住在典型的日本屋舍，穿洋服，像弟弟的小孩則穿和服。這個「我」又和弟弟一起看雨後閃閃發光的水珠，兩人都穿著和服。或許對當時少數相當日化的臺灣家庭而言，這是寫實的，

67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202、208~214、216~219，尤其是頁216~219兩幅跨頁大照片（圖版110、111）。

68 關於旗袍的出現及其長短變化，見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567。

69 III-1-p2~3、III-1-p15。

70 緣側，日本傳統家屋鋪著木板面外的長廊，有石階可上下。

71 III-1-p30。

72 III-1-p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對絕大多數臺灣學童來說，這樣的插畫無法反映他們所熟悉的社會實況。插畫中的形象或許能引發他們憧憬和遐想，但他們大抵無法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把主人翁畫成穿和服，是否具有要臺灣孩童逐漸以日本孩童的意象為「自我形象」呢？讓我們比對第二期與第三期同樣題為〈四方〉的插圖（圖22-1、22-2）。[73]課文內容完全一樣：「太陽出來的方向是東，太陽下山的方向是西。面向朝日，把手伸開來看看。右手的方向是南，左手的方向是北。東西南北叫做四方。」主人翁由穿臺灣衫褲、布鞋，一變而為穿飛白花紋布（かすり）和服，足登人字形帶草屐（草履）。如果上一節所討論的插畫中穿和服的孩童仍可以看成日本人或日化的臺灣人，這裡穿和服的孩童則是課文的主人翁，是面向太陽伸開雙手學習認識四方的當事人，也就是使用讀本的兒童的自身。換句話說，這是兒童應該認同的「自我形象」（如果我們把第一期同樣教「四方」的插圖放在一起考慮的話，這個意圖就更加明顯了，見圖22-3；[74]此圖的主人翁是「小孩」(子ども)，文章的用字遣詞和上引第二、第三期稍有不同）。當然，第三期低年級課文中的主人翁，多數仍穿著可以辨識為臺灣孩童的服裝，但由於「內地風」的滲透，他們開始具有雙重的形象，可以是臺灣風的，也可以是內地風的，兩者不是截然區隔的，而是互通的、可變換的。這是插畫中「民族界線」的逐漸模糊化，學童再也無法由插畫中的服飾來區別臺灣人和日本人。

隨著日本統治的深化，日本人在臺灣社會漸次增加其「能見度」，臺灣人和日本人雜處一處的情況也相對增多。此一「社會實況」如何呈現於第三期插畫中呢？第三期插畫中開始出現比較多臺灣孩童和穿著日本和服的孩童（或日本人，或日化臺灣人）一起遊玩的插畫，如玩球、放風箏、上課等。[75]臺灣人和日本人一起出現的場域除了第一、二期也

73 圖22-1，II-3-17；圖22-2，III-3-15。

74 I-6-9[2]。此為該課的「應用」，內容為：「小孩現在面向旭日站著。這個小孩的前面是東，背面是西，右邊是南，左邊是北。」

75 III-1-p40-41、III-2-12、III-2-17、III-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的火車站和市場之外，[76]增加了街道和公園。[77]這當然是寫實的，然而，與其說這是反映社會實況，倒不如說是反映殖民統治者對「日臺融合」的期望。

五、規範意味濃厚的後二期插畫

臺灣總督府從一九三五（昭和10）年起著手編纂第四期《公學校用國語讀本》。這個時候，九一八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稱為「滿洲事變」）已經發生，日本進入歷史上所謂的「十五年戰爭」階段（1931~1945），對外侵略（尤其是對中國的侵略）意圖益趨明顯，對內以及對殖民地加強統制。在此一氣氛底下編纂的新國語讀本，內容有很大的改變，插畫指導原則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此期讀本卷一於一九三七年四月開始使用。茲將編纂要旨中有關插畫的部分迻譯於下：[78]

> 插畫至卷五為止全部彩色印刷。插繪中，本島人的服裝採和服或洋服，避免傳統的臺灣服。用意在於透過插繪以改良習俗，或使同化於內地人風的感覺。
>
> 雖然不是插繪的問題，想附記於此的是本島人名字之事。在這次的讀本中，所有男孩女孩，變成像太郎、花子這樣的內地人風（的名字）。姓暫時如木下或山川者指內地人。最近的將來，社會情勢若有所變化的話，高學年用（讀本）說不定本島人連姓都改為內地式也說不定。

根據此一原則，新讀本中插畫的臺灣人不再穿著臺灣式服裝，而改成和服、洋裝。更值得注意的是，課文虛擬的主人翁一概使用日本人的名字——至此作為民族重要識別標記的名字遂失去識別的功能。在這裡，我們看到殖民統治者想從「形式」上泯除日臺人之間的民族分際，但這裡

76 III-5-9〈テイシヤバ〉、III-6-12〈年のくれ〉、III-6-14〈市場〉。

77 III-3-19〈アマアガリ〉、III-3-20〈金魚〉、III-6-1〈公園〉。

78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上）〉，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謂的泯除民族分際是一面倒的，是要讓臺灣孩童把日本人的形象當成自我形象來學習。

此期插畫中男學童的標準形象是剃光頭，穿「霜降色」（雪花色，藍中雜白點）學生制服，[79]上為襯衫領直襟五釦短衫、下為及膝短褲，著鞋，或戴學生帽，或載運動帽；休閒時的服裝是短袖（或無袖）白上衣、深色短褲，或戴帽或不戴帽（圖23-1、23-2、23-3）。[80]小女孩剪短髮、穿圓領連身洋裝，洋裝形形色色；[81]年紀稍大的女生或剪短髮，或留長髮，上著水手服（水兵服）、下著裙，這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本土開始流行的女學生裝扮，也是當時臺灣許多公學校的女生制服（圖24）。[82]在髮型方面，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女孩的髮型有前額劉海剪成一直線、頸上後髮剪齊至耳上一公分左右，有如頂個西瓜皮，在當時稱為「河童頭」（圖25）。[83]母親家居時穿著簡單的衣裙，父親穿立領直襟排釦上衣、著長褲（圖26）。[84]不過，母親有時穿和服，[85]父親也有打領帶穿吊帶褲的時候。[86]祖父母級的人物，穿著簡單的洋裝，[87]但樣式仍給人舊式的感覺。

通觀此期插畫，如同編纂要旨說明的，再也看不到穿著傳統服飾的臺灣人。人物、服裝、家屋等，是否反映「社會實況」已經不再是編纂者關心所在。雖然皇民化運動的正式提出在一九三六年秋天，翌年開始陸續落實於政策中，這套讀本的插畫卻已經先其開始了。如上引文獻所

79 讀本彩色插畫的學生服是「霜降色」，不過，筆者曾向王世慶先生請教有關公學校制服的事情（2004年9月22日），蒙王先生賜告霜降色是高等學校制服的顏色，公學校則採用「國防色」（草綠色）。茲記於此，待進一步查考。

80 圖23-1，IV-1-p47；圖23-2，IV-2-p4；圖23-3，IV-3-18。又見IV-1-p44、IV-3-9、IV-5-7。

81 小女孩各色洋裝見IV-2-p18~19跨頁圖。

82 IV-1-p29。

83 IV-1-p53，又見IV-2-p10，IV-2-p20。也有後髮剪至耳上的，如IV-2-p30。

84 IV-2-p42。

85 IV-4-11、IV-3-16。

86 IV-5-8。穿西裝打領帶的父親，見IV-10-8。

87 祖母裝扮見IV-5-21、IV-6-21、IV-7-5。祖父見IV-4-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的，課文中的主人翁都改了日本名字。由於虛擬人物大抵只有名字，不稱姓，因此，姓改不改毫無關係。在卷一中，最先出現有名字的小女孩是「タマコ」（玉子），若在第二、三期，她可能就叫做「阿玉」。[88]小男孩則是「マサヲサン」（正夫或正雄，我們姑且稱他為正夫；此一讀本除了幼童稱「チャン」外，男女學生都稱「サン」）。玉子穿連身洋裝，足登日本人字形帶木屐。[89]正夫的父親穿和服，戴西洋涼帽，腳上也是一雙木屐。[90]正夫的生活是道地的日本式，並且相當「近代化」——如圖27八幅連環畫似的插圖所示：1、早上他身穿和式睡袍（寢巻き），從一人一舖墊的日本式被褥中起床。2、他用自來水擦身體。3、他跪坐在矮几前吃早飯。4、他跪坐在矮几前複習功課。5、他戴草帽出門找朋友トモキチ（友吉）。6、兩人一起捕蟬。7、他回到有緣側的日本式屋舍。8、他跪坐著吃點心——請注意，那是和菓子（日式甜點）的吃法。[91]這位正夫是日本小孩還是臺灣小孩？由於主人翁的名字統一用日本名字，無由判斷。幸好現存文獻中留有關於此卷讀本頗為詳細的編纂要旨，撰稿者指出：「雖然正夫サン的住屋模樣、生活樣式等是內地風，這是以本島兒童為目標的。」（底線為筆者所加）[92]也就是說，正夫是臺灣小孩——在課文的設計上是要被當成臺灣小孩來理解的。如果同樣的插畫出現在第一、二期，臺灣學童很容易區分出「伊是日本囝仔」，到了第三期可能有點混淆，有時分得清楚，有時分不清楚，但到了這一期可就別無選擇了——「咱們都是日本囝仔」。

以正夫為始，這期插畫具有相當強烈的規範意味，呈現出殖民統治者所期待於臺灣人的，因此這些意象往往是先於時代的。例如，卷一有主人翁和哥哥早上參拜神宮的插畫，主人翁穿著普通衣服，哥哥則穿

88 IV-1-p34。

89 IV-1-p34。

90 IV-1-p35。

91 IV-1-p40~41。

92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中）〉，《臺灣教育》420（1937.7，臺北），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服、戴洋帽。[93]卷二有以「オマツリ」（廟會）為主題的課文。我們若回頭看第三期，課文中也有以「おまつり」為題的課文，插畫是「大爺矮仔爺」出巡，道地的鄉土色彩（圖28-1）。[94]但是，第四期兩幅廟會的畫則極為不同，一幅畫神社的入口，鳥居前人來人往，有日本人和臺灣人；參道兩旁有攤販。另一幅畫著一群人抬神輿的樣子。神輿是日本神輿，上有鳳凰，抬神輿者上著號衣（法被）、[95]下著白短褲，多人手持「日の丸」（日本國旗）的扇子（圖28-2、28-3）。[96]讀本的編纂者坦白指出：「插繪的情景、本文的記事，如果和本島現在的實況相比的話，或許多少有走過頭的地方也說不定。但是，在各地競相建立神社、努力於隆興祭祀的今日，若說呈現這樣的情景的時期正往目前到來，也未嘗不可。」（底線為筆者所加）[97]也就是說，臺灣遲早會走向這個情況，教科書不過是先走一步罷了。

這一期插畫也先實施「正廳改善」。正廳改善是「臺灣人家庭正廳改善」的簡稱，是臺灣總督府推行臺灣宗教改革的一環，意在勸使臺灣人將供奉神像和祖先牌位的傳統神桌改成日本神道神龕（神棚）的陳設方式，以奉祀「神宮大麻」（象徵天照大神的神符）。[98]正廳改善運動開始於一九三六年，這卷讀本編纂於此一運動開始之前後（1935~1937），當時臺灣人家庭中設置神龕的為數不多。圖26正廳的神桌上沒有傳統的公媽牌和神像，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式神龕，兩只對瓶插著楊桐（　〔さかき〕），其後的掛軸寫著「誠」字。讀者若注意，兩邊的門上也繫著求自神社的稻草繩（注連繩〔しめなわ〕）。這是擬想的元旦景象。這

93 IV-1-p49。

94 III-5-15。

95 法被（はっぴ），藝匠、工匠等所穿，在領上或背後印有字號的日本式短外衣。

96 IV-2-p13~15。

97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下）〉，《臺灣教育》421（1937.8，臺北），7。

98 關於「正廳改善」運動，可參看蔡錦堂，〈日據時期的臺灣宗教政策研究——奉祀「神宮大麻」及發行《神宮曆》〉，收於鄭樑生主編，《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1991），313~3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的正廳再度出現在卷十二。卷十二於一九四二年八月發行，此時皇民化運動已如火如荼地進行，而此課以「皇民奉公會」為題，正廳非作此模樣不可了。[99]

第四期讀本的虛擬主人翁皆改採日本名字，如秋子、玉子、花子、正夫、太郎、次郎等，再也無法憑藉名字來區分彼我。然而，當不得不區分民族別時，例如擬強調「日臺融合」時，怎麼辦呢？卷二有一課描寫主人翁和好友木下君平日一起遊玩的情景。[100]光看插畫當然看不出民族別，但課文給了線索——因為友人姓「木下」，所以是日本人。在民族分際殆已蕩然無存的插畫世界中，何以要特地造個「木下君」來呢？這是有原因的。編纂要旨寫道：「『木下君』是打算當成內地人兒童的。」課文描繪主人翁（我）和居家附近的內地人兒童一起滾鐵環（一種遊戲），放風箏，下雨天在友人的家中看圖畫書等情景。編纂者特地呈現臺灣孩童和日本孩童的友好交游，是「滿懷著暗地裡給內臺融合一助」的希望。[101]真可說用心良苦！

雖然此期在人物、服裝、家屋方面，規範意味十分濃厚，遠離現實，但在其他方面則仍然維持著寫實求真的畫風。例如卷一第二十二頁云：「有豬在。是母豬和小豬。」插圖中的母豬和三隻小豬是「約克郡豬」（ヨークシヤ），六白和尾巴捲的樣子是「質之於專家，根據相片而繪製的。」[102]就是規範意味濃厚的「正廳改革」插畫，日本神龕安置的位置也頗為考究，是和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的人士商量得來的。[103]卷三第十二課配合課文〈こがね虫（金龜子）〉有一幅跨頁插圖，金龜

99 IV-12-20。

100 IV-1-p31~32。

101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上）〉，9。

102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中）〉，50。作者按，「約克郡豬」（Yorkshire），豬的品種的一種。原產地英國約克郡。白色的優良種中有大、中、小三種。胸深厚、胴長、大腿肉發達、四肢短直。

103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旨（下）〉，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一般停留在葡萄和相思樹的葉子上，這篇課文選擇畫葡萄棚。[104]即使採用舊讀本的教材，插畫視情況也有所調整，如卷六第二課〈稻刈（割稻）〉，課文大致相同，二幅插畫則重新繪製，打稻穗的機器改採新式的。[105]總之，編纂者用心之細，令人歎服。

第四期讀本最後一冊於一九四二年八月發行。實際上，這一年三月新的國語讀本第一卷已經發行了，這就是第五期國語讀本，總共包括二卷《コクゴ》、二卷《こくご》，以及八卷《初等科國語》。第五期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完成全十二冊之發行，而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臺灣殖民統治，因此這一期讀本使用的時期很短，前後四年。這一期教科書發行於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941年12月8日）之後，此時日本對外征戰日趨激烈，在本土和殖民地進行如火如荼的戰爭動員，統制日趨嚴密，因此讀本內容具有濃厚的「戰時色彩」。關於此期的內容，已有研究可參考，茲不贅述。[106]讓我們看看在戰爭深刻化的一九四二年春天至一九四四年冬天之間，為配合戰爭情勢而編纂的新國語讀本如何向臺灣學童呈現臺灣人的形象。

此期前四卷彩色印刷，比起第四期少了一冊，共四冊，紙張品質低劣，偶見摻有甘蔗渣，反映戰爭時期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107]這一期的男學童理光頭，穿白色短袖上衣，卡基色短褲、束皮帶；冬天則外加卡基色長袖外衣，下著卡基色短褲。這是當時男學生的制服。他們穿鞋，帽子大致有學生帽、運動帽和圓頂圓沿帽三種（圖29-1、29-2）。[108]女

104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三、卷四編纂要旨〉，《臺灣教育》432 號（1938.7），29。

105 加藤春城，〈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卷五、卷六編纂要旨（二）〉，《臺灣教育》444 號（1939.7），
9。舊讀本之圖在 III-6-5，18。

106 見許佩賢，〈戰爭時期的「國語」讀本解說〉，收於《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錄．索引》，79~95。這篇文章把第四期和第五期讀本內容合起來討論。

107 魏德文，〈從重刊《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看教材印製史與景印始末記〉，33。

108 圖 29-1，V-1-p28；圖 29-2，V-2-p56~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孩穿鞋，著連身洋裝，或白上衫深色短裙，剪河童頭，有些插畫明顯畫出頸後推剃的髮青（圖30）。[109]插畫中的河童頭似乎比實際短很多。筆者將教科書的插畫拿給上過公學校的老一輩臺灣人看，他們異口同聲說：「沒那麼短。」一位還說：「畫得太誇張了。」和第四期相比，這一期最大的不同在於不再出現穿水手服的少女。母親穿洋裝，父親穿卡基色國民服，但也有穿卡基色西裝打領帶的（圖31-1、31-2）。[110]卡基色顯然是這一期的「主色」。祖父母的基本形象是穿高領有釦洋裝，樣式保守，[111]祖母的形象有時是戴眼鏡的。[112]

如果第四期的正夫過著是日本式的生活，那麼這一期的主人翁更是過著道地的日本式生活。正夫也是此期第一個出現的有名字的主人翁，他穿著和服起床，端正地跪坐著（圖32）。[113]另外，《コクゴ》一、二中各有一幅彩色跨頁圖，沒有文字，一幅描繪主人翁的日常生活（圖33），另一幅是過新年的樣子（圖34）。[114]在這些連環畫似的意象中，參拜神社是一日中最首要的事，而女孩子穿和服、新年用毽子板（羽子板）拍羽毛毽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這是教育上期望於臺灣兒童的，是理想的圖景，無庸說是遠離當時一般臺灣學童的生活的。圖繪中元旦母親穿和服，父親穿燕尾服，這裡所呈現的不是「中流以下的社會實況」，讓人想起第一期那些穿戴齊整，有富貴氣的臺灣傳統服飾。在戰局吃緊、物質日趨匱乏的一九四〇年代，教科書中出現這種「上流」穿著，實在令人疑惑。由於欠缺相關文獻，無法遽下推斷。

女孩從戴眉勒簪花，穿衫褲，到剃河童頭，穿和服，婦女從穿大襟衫，綁小腳到穿和服、羽織（和服外褂）、草屐（草履），是何等的變化！我們當然無法說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最後階段，日化程度相當深的臺

109 V-1-p38。

110 圖 31-1，V 初-2-4；圖 31-2，V-3-16。

111 V-1-p66。

112 V-4-19、V 初-4-7。

113 V-1-p24。

114 V-1-p66-67、V-2-p46-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人家庭沒有婦女穿和服草屐的，但可能不多見——霧峰林家的夫人們似乎不時興穿和服。總而言之，臺灣婦女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教科書中，規範的意義遠遠超過其他。臺灣人最後在教科書中完全日本化了。

六、小結：從寫實到規範

綜合五期讀本插畫中所呈現的臺灣人形象，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主要的現象，就是愈是前期愈寫實，愈到後期規範意味愈濃厚，愈遠離臺灣「社會之實況」。雖然如此，後期的插畫也多少反映了臺灣社會的實際變化（如西服逐漸取代傳統服飾），只是呈現的面相有所偏頗。此外，服飾原先是民族的標誌，早期插畫中臺灣人和日本人服飾各異，學童容易辨識彼我，到了後期則「融為一體」，分不清彼我。茲將五期插畫臺灣人形象之變化撮述如下。

第一期《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的臺灣人形象寫實風格強烈，男辮髮女纏足，臺灣人的傳統生活樣式一一呈現於插畫中，但其中亦流露出移風易俗的教育用心，因此明明當時纏足女學童仍多，插畫中的女學童則看不到纏足者。第二期插畫中的臺灣人形象最重要的變革是男斷髮女不纏足，但仍穿著傳統服飾，惟較前簡樸。這兩期插畫中的臺灣人和日本人基本上維持「民族隔離」狀態，兒童能輕易分辨「誰是誰」。第三期插畫中臺灣人最顯著的變化是「改裝」和「內地色」的加強。「改裝」限於男性，他們不再穿縫著布鈕的傳統服裝，人人改著西式剪裁的服裝。此外，低年級課文的插畫開始出現穿和服的主人翁，然而不同於第二期的，這個主人翁不是日本人，而是學童自身；換句話說，插畫中臺灣學童的自我形象是雙重的，可以是臺灣風格的，也可以是日本風格的。然而這種「雙重性」到了第四期則統一為「日本式」，臺灣人或著和服，或著西服，主人翁名字一概改為日本名字，也開始過起道地的日本式生活。直到第三期在插畫中仍能作為辨識彼我的民族標誌——服飾與名字，於焉消失殆盡。第五期編纂於戰爭時期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推行之際，插畫中的臺灣人徹底日本化，參拜神社、穿和服是生活的一部

臺灣本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日本神龕也堂堂進駐臺灣人傳統家屋的正廳。這是承續第四期插畫的精神：雖然有點走過頭，但這樣的情景正在出現中；更確切地說，殖民當局希望並致力於使這樣的情景出現在臺灣社會。至此官方的規範意圖昭然若揭，寫實的風格喪失殆盡。

由於五期國語讀本有若干課文幾乎每期都出現，最後，讓我們來看看在這四十多年的時光裡，同一主題如何在插畫中呈現。首先，以「柱鬼」為題的課文出現在第一至第三期的讀本中，「柱鬼」（ハシラオニ）是一種遊戲，一人扮鬼，其他人各自抓住一根柱子或樹榦，鬼在眾人互換位置時搶柱子，柱子被搶走者當鬼（類似大風吹遊戲）。這三幅圖正好顯示了臺灣男學童由辮髮到斷髮，由不改裝到改裝的三階段變化（圖35-1、35-2、35-3）。[115]「洗濯」是五期讀本都出現的主題，第二期插畫沒有人物，只有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其他四期畫有洗衣服的婦女，第五期第二幅也是晒竿，掛著和服。從洗衣服的婦女到晒竿上的衣服，國語讀本插畫世界中的「時代推移」，躍然眼前（圖36-1、36-2、36-3、36-4、36-5.1/5.2）。[116]「遠足」也是從第一期到第五期都有的課文。遠足是公學校學生校外活動的重要節目，就讀公學校的臺灣人對此大都留下很深的印象。根據筆者的問卷調查，一百二十七位填寫者中有一百零二位對遠足有印象，且絕大多數（九十五位）都能寫出一個到數個目的地。[117]作為課文的「遠足」在各期國語讀本中占有相當的分量，第一期分成兩課來教，有兩幅插畫；第二期課文比較簡單，有一幅插畫；第三期課文是詩歌，有六幅插畫；第四期有兩幅跨頁彩色插畫，頗為豪華；第五期課文占兩頁，未標課名，有一幅跨頁彩色插圖。[118]限於篇幅，無

115 圖 35-1，I-3-9；圖 35-2，II-3-8；圖 35-3，III-3-10。

116 圖 36-1，I-4-16；圖 36-2，II-3-11；圖 36-3，III-3-16；圖 36-4，IV-3-11；圖 36-5.1/5.2，V-3-11。

117 根據「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臺灣公小學校教育問卷」項目之一「您對遠足有印象嗎」之統計結果；遠足目的地包括水源地、原住民部落、神社、公園、其他公學校，以及附近名勝等。

118 I-6-9、I-6-10；II-5-3；III-7-26；IV-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一一於此排比呈現，姑記於此，以誌其別出心裁。

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由臺灣總督府直接編纂，殖民統治者希望臺灣人學習甚麼，可說充分顯露在教科書的內容中，這些可以拿來和總督府的政策相比對，幫助我們更具體而微地了解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五期國語讀本卷一發行年分間隔五至十五年，第一期編纂於軍憲鎮壓略定而改採所謂舊慣溫存政策之際，第二期編纂發行於大正之初，第三期編纂發行於大正末昭和初，第四期於日本發動蘆溝橋事件的一九三七年發行，第五期則於「大東亞戰爭」（史稱太平洋戰爭）「勃發」之後兩個多月發行，似乎和日本在臺殖民統治及其對外征戰的重大變化若合符節。作為殖民地教育首要科目的國語讀本，無疑提供一個歷史的橫切面，讓我們得以由內而外，由下而上，檢視驗證殖民統治的性質及其變化，並獲致底層的、實踐面的具體認知。例如，十餘年前我致力於皇民化運動之研究時，若有幸能利用這完整的五期國語讀本（當時這類材料有如天方夜譚），相信更能掌握時代更迭的徵候。總之，五期國語讀本插畫，雖然只是插畫，實則具有超乎圖畫本身的豐富訊息，不能等閒視之。

臺灣總督府發行的五期國語讀本插畫中所呈現的臺灣人形象，不止反映了殖民統治者統治政策的變化，更以非常明確的意象呈現殖民者期待於被殖民者的形象。臺灣學童在受教育的過程中，透過教科書的文字與圖像，學習到自我的形象。這樣的自我形象是他塑的，是被殖民者所定義的，且愈到後期愈具規範意味。從早期的尊重本土傳統，到可臺可日的兩義性中期教育，到祛除傳統而以日本人為學童自我形象的後期殖民地教育，其間的變化是很大的，對不同世代的臺灣人起著不同的歷史作用。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其困難與有趣的地方也就在此。

*本文曾於二〇〇四年十月十二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講論會，承蒙評論人顏娟英教授及與會人士惠賜寶貴的意見，非常感謝。兩位論文審查人也給了很好的修改建議，使得本文得以少些缺點，謹此致上深謝之意。其中關於參考圖像學的建議，由於允許改稿的時間很有限，一時無法補寫，惟待日後多加學習。

（責任編輯：黃子寧　校對：吳立仁　緜柏辰）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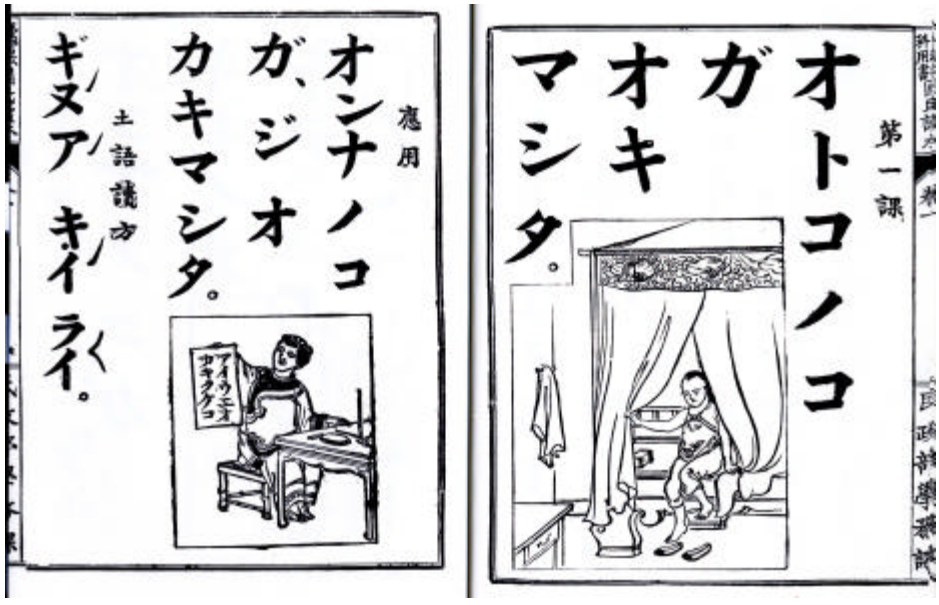


圖1



圖2-1　圖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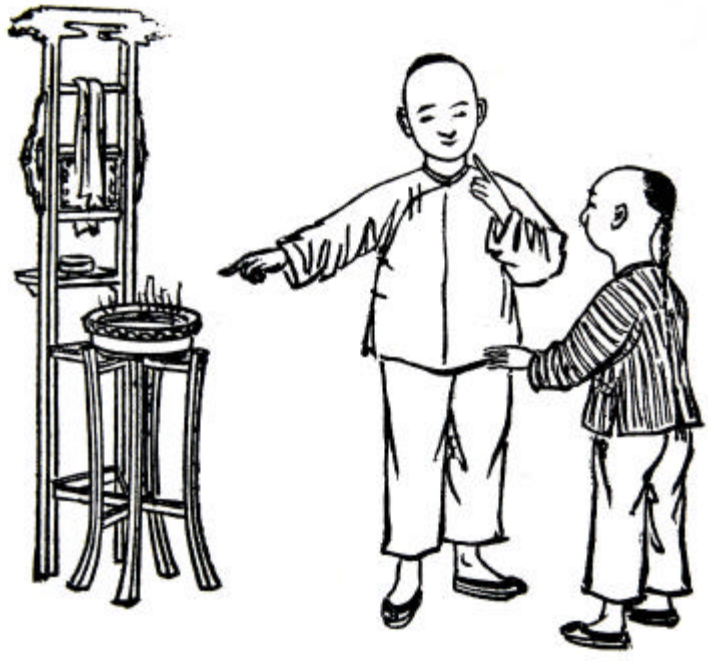


圖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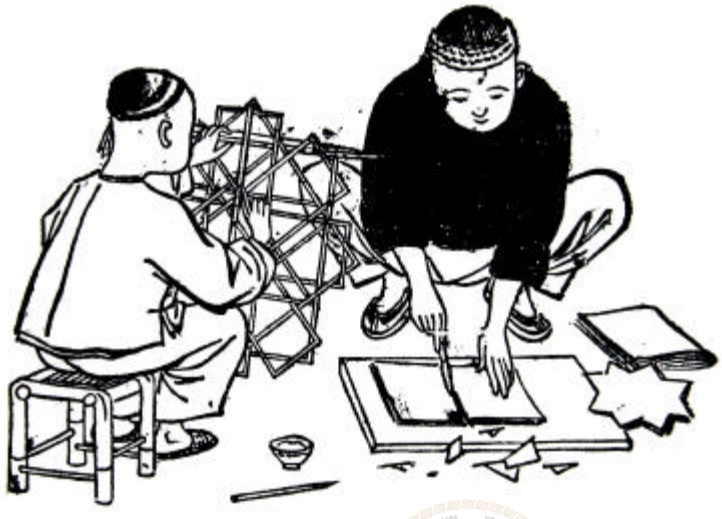


圖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



圖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1（局部）



圖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3



圖6-4



圖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1



圖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9-1



圖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1



圖10-3



圖10-2（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圖12



圖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4



圖15-1



圖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6-1



圖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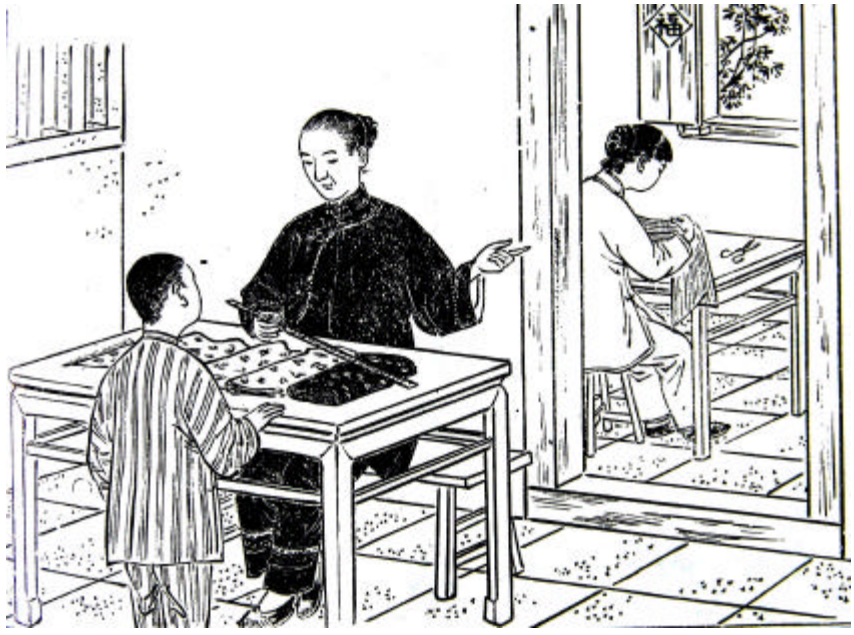


圖17



圖18-1



圖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



圖20-1



圖2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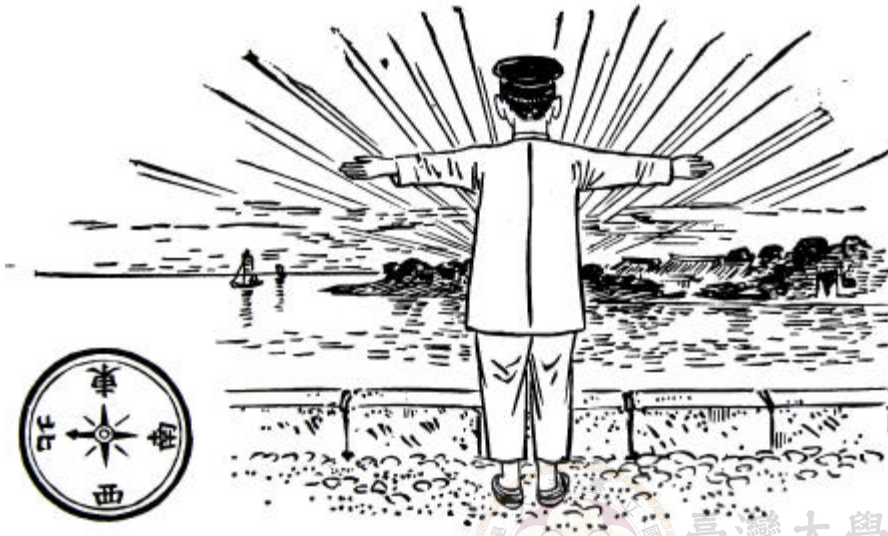


圖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2



圖22-3

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1（原為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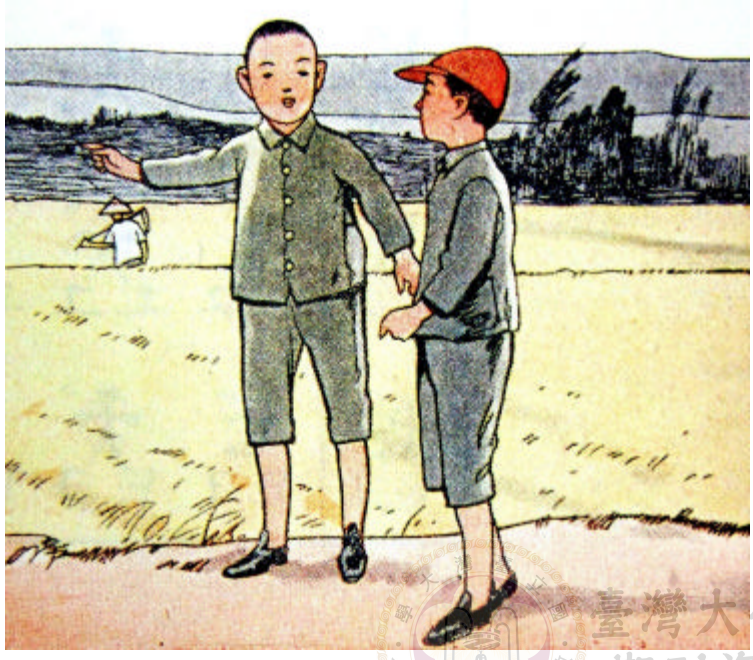


圖23-2（原為彩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3-3（原為彩色，局部）



圖24（原為彩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5（原為彩色，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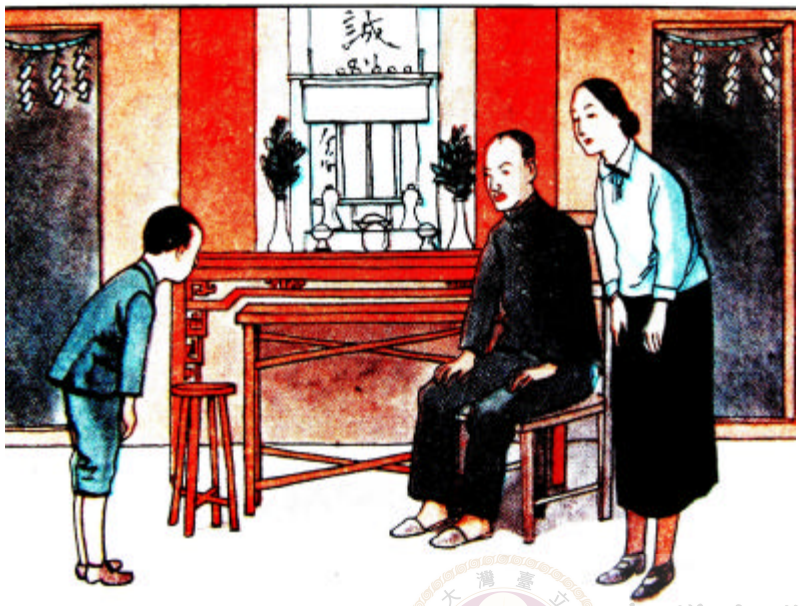


圖26（原為彩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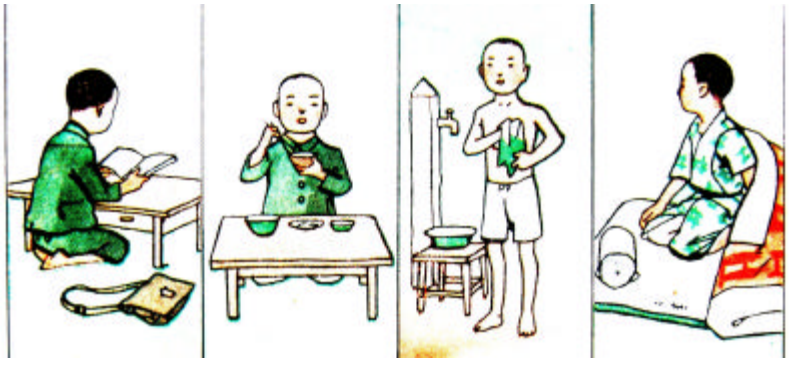


圖27-1（原為彩色，圖序由右至左）



圖27-2（原為彩色，圖序由右至左）



圖2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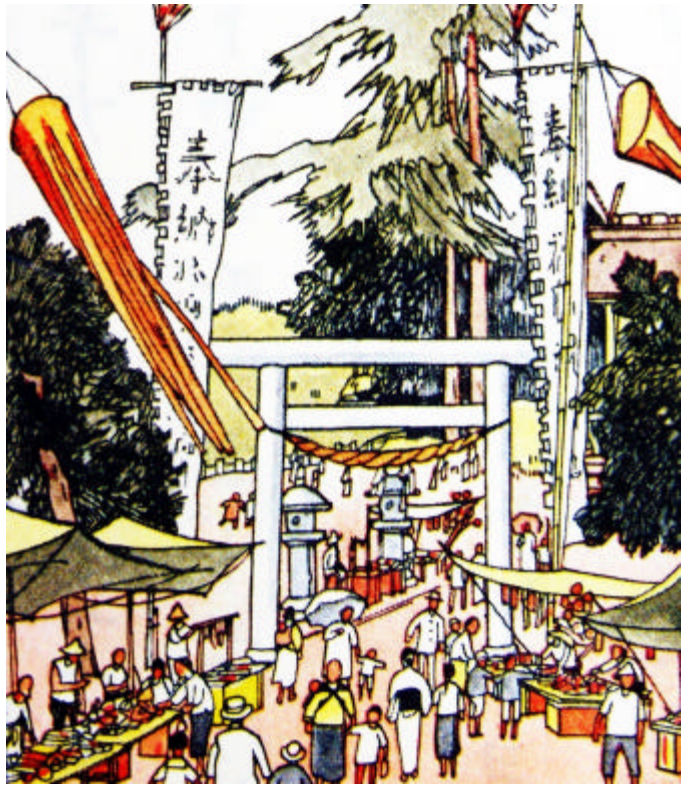


圖28-2（原為彩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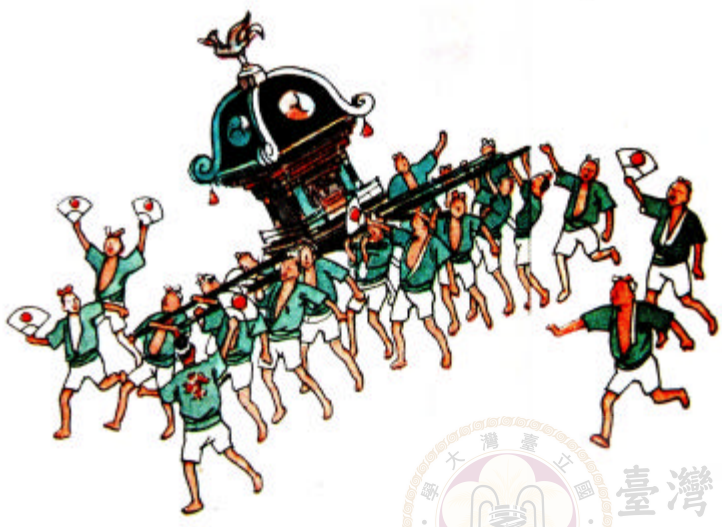


圖28-3（原為彩色，跨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1（原為彩色）



圖30（原為彩色，局部）



圖29-2（原為彩色，跨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1



圖31-2（原為彩色，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2（原為彩色）



圖33（原為彩色，跨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4（原為彩色，跨頁）



圖3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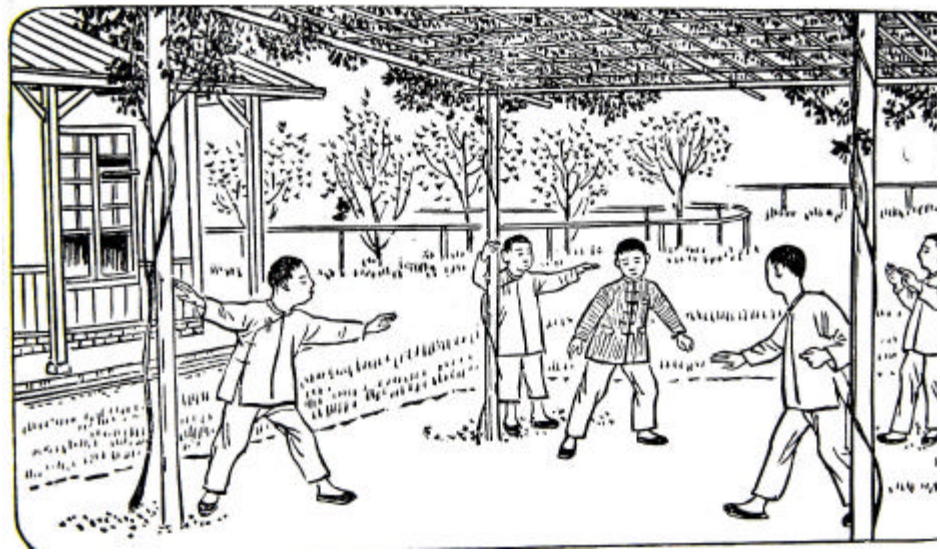


圖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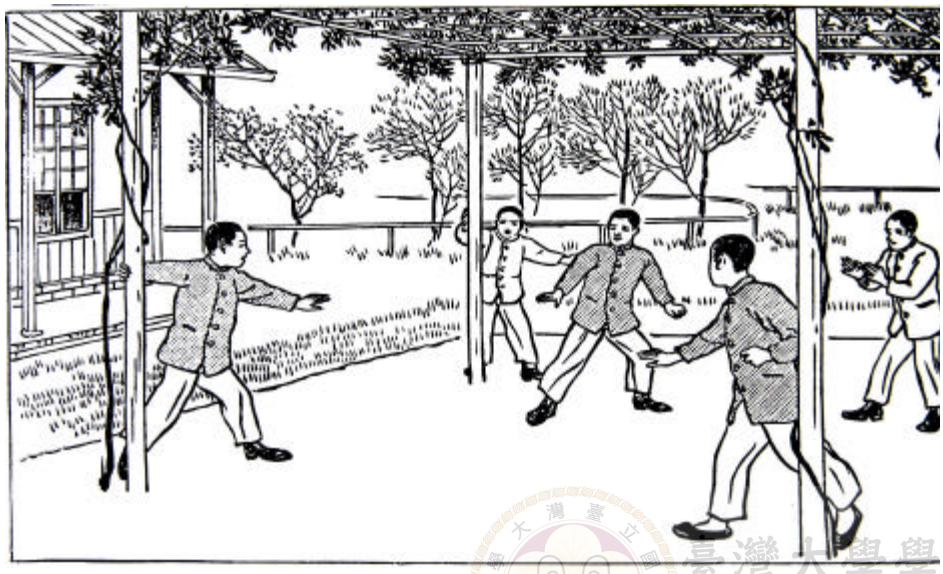


圖3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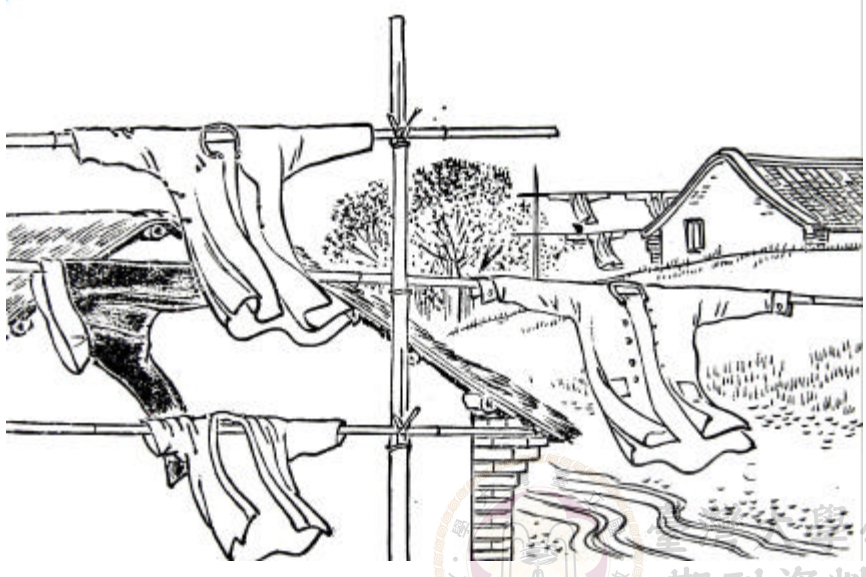


圖36-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6-3



圖36-4（原為彩色）

臺灣人文與藝術 期刊資料庫



圖36-5.1（原為彩色）



圖36-5.2（原為彩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etween Reality and Norm: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as Illustrated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Reader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in Colonial Taiwan

Chou, Wan-yao*

Abstract

Japan took over Taiwan as its first colony in 1895.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aiwan soon established an elementary school (*kogako*) system for Taiwanese children in 1898. The National Language (i.e. Japanese; *kokugo*)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taught. Until Japan ended its rule in Taiwan in 1945,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issued five editions of the Japanese readers. These Japanese readers were abundant in illustrations. Taiwanese were depicted in different ways in each edition. What were the basic variations that outlined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in the five editions of Japanese readers? What kind of "self-images" did the colonial educators intend the Taiwanese children to acquire? How were these images related to actual social scene? Can we grasp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colonizer through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illustrated in those reader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answer.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se readers reveals that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shifted between what Taiwanese were commonly known to be and what Taiwanese should become in the ey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t is a story of reality and norm. In the first edition,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reflected to a great extent what Taiwanese usually were, although normative attitudes can be detected. Thus, we see women with bound feet, men wearing plaited hair (a queue) and traditional Taiwanese (Manchu-Chinese) clothes, but girls of tender ages were not foot-bound and opium-smoking was nowhere to be seen. The Taiwanese appearing in the second edition had new images—men and boys cut their hair short (Western style), while women and girls no longer bound their feet. This did not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flect the re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lthough men would soon discard the traditional hair-style, the practice of foot-binding took longer time to disappear. The third edition illustrated Taiwanese boys in Western clothes, and the so-called "Japanese life style" (*naichi fu*) also gained visibility. For instance, Taiwanese children started wearing *kimono*. In other words, the "self-image" of Taiwanese children was "Japanized" to some extent. The fourth edition began to appear in 1937. Soon there would come the fifth (and final) edition in 1942.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illustrated in these two editions were strongly normative. The Taiwanese wore either Western clothes or *kimono*, living a Japanese way of life. This was the period (1937-1945) wh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fervently carried out the movement of "making Taiwanese the imperial subjects" (*kominka undo*). In textbook illustrations, it became almost impossible to discern who was Taiwanese and who was Japanese.

In sum, the Taiwanese depicted in earlier editions of Japanese readers reflected more of the social reality on the island, while later ones more of the images expected of the colonized by the colonizer. The images of Taiwanese illustrated in the Japanese readers also reveal to a large degree the cultur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during its 51-year rule of Taiwan. The policies started from one that respected Taiwanese native customs (*kyukan onzon*) and ended in one that campaigned to make Taiwanese into "true Japanese".

Keywords: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Japanese language readers (*kokugo tokuhon*), illustrations in textbooks, images of Taiwanese, *kominka* movem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